



好 读 书 读 好 书

近日,新星出版社将历史学者马勇过去近三十年间有关晚清历史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丛书,叙述了1894—19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读者提供了一部重新认识和思考晚清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读本。



《觉醒》《维新》《国变》《革命》 马勇 著 新星出版社

以温情与敬意回望历史 『晚清四书』出版

不要随便写东西,以免将来后悔

1979年,参加过军,当过农民、下过矿井的马勇,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入学后借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大学期间仔细阅读了三遍,对中国思想史的兴趣从此开始。

四年后,马勇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老师的研究生。朱老师告诫马勇,“三代之下无真学问”,学问只在古典、在古史。受当时大环境影响,历史系的老先生更是不把它作为学问来看待。因此除了跟汤刚老师读过《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他那时基本没有接触过明代以后的文献。毕业后,朱维铮老师推荐他到社科院历史所从事研究。

为了一套宿舍,马勇听从前辈的建议,1986年8月拿着去历史所的派遣证到近代史所报到。这一改变不仅让马勇得到一间平房栖身,更重要的是,这个改变深刻影响了

他的学术道路方向。那时的学术界风气、管理,也与现在很不一样。不论是老师、老先生,还是研究所、研究室领导,没有人催促马勇去写文章、写书,老一辈敦促马勇这些后辈的是“好好读书”,“不要随便写东西,以免将来后悔”。马勇每天的事情,就是借书、读书、还书,直到1991年才发表第一篇文章。从大学算起,马勇毫无功利地读了十二年书,他自认为这些年的阅读让他后来几十年受益无穷。

马勇真正集中精力研究晚清史,还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2000年,近代史所承担了一个编撰《中国近代通史》的课题。之前马勇发表过关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文章,所长就让他负责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一个时间段的写作。2014年,由马勇等中青年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出版。

甲午战争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节点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都有过类似的表达。这个变化的节点是什么?马勇的观点是,这个节点就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转折。

甲午战争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截然分成两段。之前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大都是极端自负的,不论学习了多少西方经验,中国人大致上还是相信“我中华文明”具有恒久价值,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只是局部的,因而那时中国人的口号就是“中体西用”,只学习西方之“用”、之“末”,而不会在“体”、在“本”上转向西方。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自信是建立在虚假的自负之上,并不真实。

由于充分借鉴了西方经验,利用了西方人才、技术,发展中国现代军事工业、国防,因而当时的中国人以为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完全有可能踏上全球化之路,一点都不影响中国分享全球化的好处。那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很自负自己的发展模式,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与日本人的接触中,不止一次推销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于日本全面西方化很不以为然。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政治精英之一,他的看法也不过如此。

除了极少数知识精英建议朝廷不能只要西方的富强,而要注意西方富强现象背后制度的、教育的、文化的因素,将西方的进步作为一个整体去看。比如教育因素,马勇指出,晚清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最初都看到了中西差异,也明白这些差异的症结在哪儿,但他们并不是像日本那样集中全国力量去办新教育,而是自以为是地“改科举”。

回望甲午战前中国三十多年发展道路,马勇认为这三十多年时间几乎被白白耽搁了,除了海军舰船、工厂企业,社会、教育、观念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即便是军队,除了北洋海军具有现代性质,绝大部分陆军还处在几十年前与太平军作战时的水平。

痛定思痛。甲午战败后,在大环境压力下,清政府终于放开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限制,终于明白十九世纪以来国际资本东移对于中国的意义。中国面临全面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机遇,所以才会有甲午战后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建设,铁路、矿产资源、城市发展、社会发展都在这个新的形势下有了不同寻常的进步。在马勇看来,1894年至1911年晚清这十几年的变革,就是走出传统,步入现代,重构中国社会,这也是他写晚清史的基本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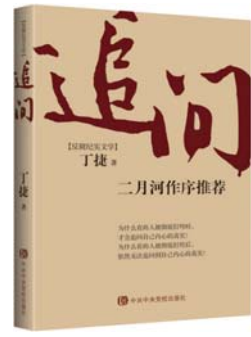
将历史人物置于当时背景下考量

不少学者评论马勇是“温情写史”,他也主张“怀揣着温情与敬意旁观历史”,对于曾经为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一直是“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

马勇借用陈寅恪“同情的理解”的原则,强调对历史上的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其作为。然而,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到难,人们在谈到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总是容易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比如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慈禧

太后,这位在过去上百年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被康梁师徒视为万恶之源,在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里也是一个脸谱化、妖魔化的存在。马勇则从历史视角重新审视慈禧太后,在他看来,慈禧并不简单是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样邪恶,那样不可理喻。在慈禧太后当国的四十多年间,晚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工业化从零起步,了一定的基础;城市化也在这个时期有了进展。马勇说,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量,而不是刻意为其辩解。



《追问》 丁捷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近日,一部反腐纪实文学作品《追问》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口述体、非虚构方式真实记录了一群落马官员的人生轨迹。作者丁捷是江苏省属某文化单位的纪委书记,《追问》是其首部反腐题材作品。

反腐纪实文学《追问》出版 探寻落马官员的“心灵史”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中纪委和江苏省纪委的帮助下,丁捷查阅了大量纪委查办的卷宗,从600多个案例中筛选出20个,并在监狱或办案点与13位落马官员面对面交谈,最终8位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在书中呈现,其中有犯重婚罪的副市长,有因对下属偷盗、制假、贩卖文物失察而受处分的文化厅副厅长,有纵容亲属搞利益集团的女县委书记,有违法乱纪的“国企巨贪”,有表面两袖清风却贪婪腐败的高校党委书记,还有和女明星风花雪月的高官等。

丁捷之前做过宣传工作,有积淀多年的采访经验,但深入落马官员这个群体时,他发现访谈并不顺利。他的采访对象都是较高级别的落马官员,阅历丰富。有的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其内心却一直紧闭;有的人依然无法转换自己的身份,摆出领导姿态,讲空话套话。丁捷以倾听者的姿态,追问这些落马者的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或者是其违纪违法的内容可以代表一类涉腐官员,或者是其人生轨迹、个性特征可以代表一类涉腐官员,大致囊括了这些年大部分查处的腐败形式和内涵。

书中写到一位因“错情乱爱”落马的赵姓副市长,丁捷在农村采访了他,他隐居在老家山区的一个小镇边,帮助亲戚料理一片鱼塘。在任职期间,赵某与小乔、小凡两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为了瞒天过海,小乔甚至借闺蜜的男友假结婚,后来还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子,最后因作风腐化、犯重婚罪被判刑两年。在访谈中,赵某坦言以告,“我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判得重一点,当时死的心都有,只是缺少一根绳子罢了”。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在美女的包围中,他一瞬间有过自卑,但他很快“顿悟”:比实力高大的是势力,比势力高大的是权力。在内心挣扎的时候,他曾经失眠,但最终完全放纵了自己,他最红最火的时候也正是他一步步走入深渊的开始。还有一位文化厅副厅长在临退休前,因分管的下属单位发生违法犯罪窝案,多名领导干部和专家利用公权力和信誉,偷盗、制假、贩卖字画文物被法办,作为分管领导,他也受到党纪的严厉处分。许多人为他感到遗憾与委屈,学仕双全、堪称人生完美的他,竟然在仕途的最后一程,因下属犯事而受到严厉问责,留下偌大的缺憾。他却说:“人说不知不为过,我作为专家和行业领导,不知也是过,知了没有有效管制,就是过,是作孽,是罪啊。”

尽管不少读者看完书后纷纷将书中人物与现实人物对号入座,但丁捷强调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不是猎奇和八卦。为了保护被采访者的隐私,丁捷对访谈素材进行了重新组合,人物形象都经过文学处理与艺术加工。《追问》的写作重点不是描绘涉腐干部如何腐败,而是追寻其人生足迹和精神演变的过程——他们的思想为什么生病、病源在哪里、是如何积重难返的,给人以警示。作家二月河评价《追问》“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当代‘罪与罚’,是一部与所谓‘落马者’正面交锋的心灵碰撞实录,更是一部哲思蕴含于理性追问之中的‘醒世恒言’”。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曲鹏
美编:马晓迪